



安得广厦千万间

——杜甫诗中的家国情怀

□ 荆晓燕

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时代，而盛唐则是巅峰中的巅峰。这一时期，三位大诗人占据了诗坛中最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诗仙”李白的诗歌意境开阔、浪漫豪放，读来令人悠然神往；“诗佛”王维的诗歌空灵静定、恬淡自然，读来令人宁静平和；“诗圣”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悲天悯人，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满纸血泪，千古常新，杜甫的作品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这力量不仅来自他出众的文采，而且来自他倾注笔端的深情，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他浓重的家国情怀。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无法割舍的亲情牵挂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杜甫对于家庭十分看重，他诗歌中经常出现对于家人的描写。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秋，杜甫因安史之乱困居长安，他思念着位于鄜州（今陕西富县）的妻儿，写下这首《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兵荒马乱，家人离散，在这样的秋夜，妻子想必也在望月怀远，不知道她会不会云鬟沾湿、玉臂生寒？而儿女年纪尚幼，可能还不知道思念身在长安的父亲吧？字里行间，真情流露。战乱之中，杜甫热情盼望收到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是又怕家书传来噩耗，所以“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从盼家书到怕家书，这种微妙微妙的心理变化跃然纸上，让人唏嘘。杜甫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在次子宗武生日那天，写下对他的勉励：“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杜甫分外珍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虽是寻常生活，读来却让人觉得平和幸福。但杜甫没有沉溺于个人和家庭的悲欢，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对国家民众的关注。他既是一个家庭的领路人，又是整个时代的记录者。他将对亲人的惦念和对人民的眷恋融合，将小家的浮沉与国家的兴衰融合，真挚而博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

杜甫出身名门，才华横溢，因而年轻时对仕途充满信心，立志在为官之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辅佐君主以济天下苍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初试不第，求取官职之路亦是四处碰壁，直到安史之乱前夕才获得右卫率府曹胥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

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历尽艰辛，只身逃出，投奔驻于凤翔的唐肃宗。肃宗感其忠义和文采，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这首《述怀》描述的就是杜甫对于此次被授左拾遗的喜悦、感激之情。拾遗虽然官品不高，但却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因此杜甫这次担任左拾遗，是他一生中最接近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期。“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这首《春宿左省》描写杜甫在门下省值夜时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系政事的勤勉。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在担任左拾遗短短一年之后，杜甫因为房琯事件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虽有经天纬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任华州司功参军不足一年便弃官，飘零江湖，生计窘迫。但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杜甫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秋天，杜甫在给道州刺史裴虬的回赠诗中，殷切嘱托他“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写这首诗时，杜甫已经老病交加、时日无多，他自知衰朽多病之躯已经无法再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了，因而嘱托朋友。他胸怀着不变的忠贞和坚韧，从未放弃过经天纬地的抱负和理想。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

杜甫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爱它的山川江河，爱它的四时风物。“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是泰山的雄奇秀丽；“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是长江的奔腾壮阔；“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是春天的明媚旖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秋天的清澈明净。所以当这样的家国破碎，那种锥心之痛无以言表，确实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战争离乱使他对于国家倾注了格外深厚的感情。他时刻关心战局进展，时刻关心国家安危，所以当听到“剑外忽传收蓟北”的消息时，无法抑制欢喜，一刻都不想等待，只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快诗，全无杜诗一贯的凝重稳健，一气奔流、略无凝滞，爱国之情奔涌全篇。暮年寓居夔州（今重庆奉节）时，杜甫创造了代表他一生诗歌最高成就的作品——《秋兴八首》组诗。《秋兴八首》以遥望长安为主题，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品中不仅呈现身世之悲、离乱之苦，而且弥漫着故园之思、家国之情。“丛菊两开他日泪，孤

舟一系故园心”明写心系故园之情，“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直抒思念国都之意，悲壮苍凉，意境深阔。就算山河破碎，就算漂泊无依，但一刻都不曾放下对国家的深情，这是一种不可撼动的坚定与执着。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心系苍生的为民情结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三吏》《三别》《悲陈陶》《悲青坂》等作品深刻反映了战争离乱中人民的痛苦生活，几乎每一首诗都是一出悲剧，字字血泪，句句沉重。其实单就作品的文学性而言，过度的写实会减损其艺术性，但杜甫为什么要坚持以诗为史、记录时代？他何尝不能纵横捭阖、恣意飞扬？“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是何等的高度！“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何等的气魄！但是，他愿意俯下身子，贴近大地，贴近苍生，去记录时代的悲歌，去担负人民的苦难。杜甫心系苍生的情结不仅体现在上述堪称“诗史”的作品中，在其日常生活细微的点滴中也有折射。公元759年岁末，杜甫迁居蜀中，次年春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草堂，过了一段相对安稳、闲适的生活。但某个秋日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使得诗人全家陷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境中。然而就是在这样“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煎熬中，杜甫更多想到的是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庇护、免除饥寒。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将自己的苦痛悲愤化为对他人的关爱，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胸怀气度，更是一种打动人心的悲悯情怀。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的确，杜甫有圣贤之心，但却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他饱尝了世间的苦难悲凉，但一腔火热的真情从未冷却。他获得“诗圣”的美誉，不仅是因为精深醇厚的诗歌造诣、承前启后的诗坛地位，更是因为他心系家国的品格、心系苍生的情怀。这种品格和情怀穿越历史的云烟，在今天仍然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明代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末科学家，自幼常因家贫而从事农业活动，他深感百姓之苦、国家之贫，存“治国治民，崇正辟邪”之志，潜心研究农业问题，形成专著。该书撰写始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终于崇祯二年（1639年），由徐光启弟子陈于龙修订完成并刻板付印。

《农政全书》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总结了清代之前的农业科学技术。全书内容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十二目六十卷，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徐光启以“农”“政”辩证关系为基础，展现了经济、技术与农业生产部门相统一的“大农业”系统观和生态观。《农政全书》的精要之处也在于，徐光启并没有仅仅将农业问题拘泥于对以往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总结，而是将目光放到了更为长远的政治生态上，将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相结合，使《农政全书》超越了以往的纯技术性的农业书籍，集中表达了徐光启以农治国的农业生态观。

时宜

传统的中国农业观讲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董仲舒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副天德，应当顺天而为。徐光启认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生养庄稼应当是天、地的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徐光启阐发出四时之政，应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是月也……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麋毋卵”，春季万物发生繁缳，应禁止伐木，禁止破坏鸟巢，禁止杀幼鸟幼兽。“季夏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有斩伐”，夏日正是万物长养时节，命人进山查看是否有人砍伐生长的树木。“防雾伤禾……靡散落于树上，则可避雾气。”秋日对作物进行防雾、防冻准备。“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教泽之，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冬季，没有存粮的农户将走失的牲畜带回不应追责，山林泽游有蔬食或可以田猎的禽兽，官吏应指引民众去获取，有相互侵夺者，论罪不赦。

徐光启提出用“草壅法”植棉，“用黄花苕佬草后壅者。田拟种棉，秋则种苕，来年割苕壅棉，留草根田中，耕转之，若苕不盛，加别壅。或种大麦、蚕豆等，并掩覆之。田拟种植棉花，使用黄花草盖草后堵塞的，秋天种植草，明年割苕草堵塞，留草根田中，耕地流转，如果草不多，另外堵塞。或者种植大麦、蚕豆等同时覆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草壅法是农业生态循环利用的系统方法，是顺应自然，改善自然条件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

土宜

“谚曰‘歇田当一熟’，言息地力也。”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土地的生养能力是维持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土壤的形态、密度、成分、酸碱度等都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如对于

碱地，徐光启就建议种高粱，且宜清明前后播种，“秦中硷地，则种蜀秫。下地种蜀秫，特宜早，须清明前后耕”。

不同时节，为维持地力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在此基础上提升施肥技术可增强地力，“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面对人地矛盾与地财矛盾，徐光启在尽力保证农家有收获的同时，采取土地用养结合的方式保持地力，优化农作物的生长与土壤的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经济作物与农作物的种植周期，徐光启主张棉花种植以一年一熟为宜，稻棉轮作，限制棉花的种植周期不超过三年，同时注意“周田作岸，积水过冬”，以改善土壤，减少杂草和病虫害的发生。在养护地力的同时，也需要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徐光启认为个体小农户如果占田过多，力不能耕，会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国家对于这种情况应采取措施予以限制。“而广虚之地，数口之家辄田二三百亩，亩蕲灭裂，丰年则为薄收，水旱则尽荒矣。此上之无法以教之，无制以限之故也。”

水利

“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徐光启苦心于水资源难以使用、南北水资源不均、朝廷政策无力等，在《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水利思想在《农政全书》中占据全篇五分之一，为解决水资源之缺提供了系统性、针对性的科学技术方法。

“故用水一利，能速数害，调望阴阳，此其大者”。在如何辩证看待自然灾害和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中，徐光启在治水问题上将除害作为基础，将兴利作为目的，这就显示出他与以往传统农业学家的不同，徐光启认为处理水害就是养民。徐光启关注到明代统治者把河运放在治理河道首位的做法，以运害农，治水却治标而不治本的错误方针，指出东南用水生谷，西北用水漕运，这是费两份水利而只收获一份谷物的低效方法，不可因为南北通运而降低农运的重要性，将水害寄希望于改道，为协调这一矛盾，徐光启在天津试验垦殖，主张在北方实行屯垦，改变南粮北调的局面，以巩固国防和民生。徐光启谈水利问题要着其根本，“不在源，即在委，源恒流，委恒汤者，故无骤涨骤于之患”。对于地方府县因增一邑之赋，实失数州之赋的得不偿失之举，也应当加以纠正，改堤为桥，复田为湖，变灾为利，“凡湖皆自然淤淀，但不宜多作田以尽之，使水无所容耳”。

针对西北地区干旱、荒废耕地的问题，“西北之地，风号沃壤，皆可耕而食也。唯水利不修，则早潦无备。早潦无备，则田里日荒”，徐光启提出了“用水之术，不越五法”，即五水之术的旱田用水方法，其主旨是依据水资源的不同情况，如地表水的“源、流、潜、委”，即地下水、江河塘浦、积水和海湖沙洲等种种水资源，可采用引水、调水、蓄水、提水等技术措施加以利用，灌溉农田。针对东南水利多涝问题，徐光启则提出“河港泄泻，围岸堤防，闸塞乘除”的治水方案，在低洼地带修筑圩岸以阻挡洪水，在圩岸上修建



闸塞以利排灌，在沿江沿海及高、低田分界处修建闸座，以防江海水倒灌。

人力

明代晚期，南北农业发展不平衡，南方人多地少，北方地多人少，人力与地力均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南方地区百姓无田可耕，纷纷“为末富、奸富”之业，而北方由于地广人稀，荒田闲置“内则关、陕、冀、邓、许、洛、齐、鲁，外则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皆耕地也，弃而芜之”。与此同时，农业也经受着工商业的冲击，农民不超过十分之三，勤劳的人不超过十分之一，一个人生产的，数十人使用，由此产生了巨大的人地矛盾。徐光启提出“均民”主张，即将南方过剩劳动力移于北方荒旷之地从事耕垦，以此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除强调人力重要性外，还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予以肯定。徐光启引述丘濬之观点：“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可以回天，况地乎？”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风土说”。徐光启的农政立足之点仍然是“在人”上，他的“荒政”一目共十八卷，约二十五万多字。在荒政篇中徐光启提出“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赉济为下”以灾前预防为主、以灾后救助为辅的荒政思想，表达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理念。对待社会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上，徐光启提出了著名的“财银之辨”，银钱仅是衡量财之多寡的手段，其本身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粟、帛才是真正的财富，能够解决社会人口的生存问题。



（上接1版头条）在理念方面，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创新探索冬奥遗产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有机统一，基于大众追求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消费需求，助力冬奥会场馆资源面向公众开放和创意改造，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模式方面，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体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沙，因地制宜进行遗产资源的多功能开发，综合考虑旅游观光、休闲健身、康复康养、运动训练、赛事筹办、会议会展、文化交流、健康教育等不同需求，打造与之相适应的精品项目，建立全时、全域、全民的冬奥生态遗产运营体系。

坚持城市更新和区域协同相结合

用好冬奥区域发展遗产，为冰雪运动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北京冬奥会实现跨地区举办，为我国留下了持久性的城市和区域发展遗产。冬奥遗产的活化利用和城市更新紧密相连，在城市发展方面，以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把北京城市副中心率先打造成碳中和示范区，把北京奥运功能区 and 首钢园区率先打造成冬奥

低碳技术应用场景和碳中和示范区，把张家口打造成为全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和世界体育名城。构建开放共享的冰雪体育区域融合发展平台，推动北京、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在体育人才、场地、赛事方面建立战略合作联盟。针对不同类型的冬奥遗产制定更有新细则，并纳入城市的整体规划与管理。通过设施更新、业态创

新、消费革新，实现冬奥遗产与群众生活的活态融合，增强城市活力和生命力，让冬奥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在区域发展方面，持续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京北生态冰雪旅游圈建设，通过文化交流互鉴创新、经济发展互惠互利、生态保护共治共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打造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以实现北京冬奥会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破局城市更新，推动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合作，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传承城市发展遗产和区域发展遗产，推动城市更新和区域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作者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

（上接1版二条）深入把握新发展理念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各有侧重、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始终崇尚创新，在关键领域、“卡脖子”处下大功夫，致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抓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为发展增添新动能；更加注重协调，自觉主动解决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

倡导绿色，科学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对外开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强化内外联动，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断推进共享，聚焦共同富裕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把“蛋糕”做大、切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我们聚焦这一理念的目标原则，悟透蕴含其中的主线脉理，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践行好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更好体现新时代推动发展的价值性、针对性、全面性，努力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站稳人民立场，在践行宗旨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新发展理念提出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可以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新发展理念“根”和“魂”。只有从根本宗旨上贯彻好新发展理念，从思想观念上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现代化观，从制度安排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把准新发展理念的目标导向，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矛盾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进入新时代，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面对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的困难，面对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现代经济体系的供需结构尚不匹配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正确认识 and 把握不同阶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瞄准短板、突出弱项，主动应对、靠前发力，既减存量、又防增量，致力构建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针对区域板块分化重组、

人口跨区域转移加快、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等现状，研究解决城乡区域差距较大问题；持续改变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现象，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正确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开放等等，才能更加精准高效地贯彻好新发展理念。

增强忧患意识，在砥砺前行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需要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临近胜利的时候，越需要居安思危的忧患，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受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俄乌冲突持续，“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受冲击，随着国际力量对

比的此消彼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见微知著，抓早抓小，随时准备应对能够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复杂困难局面甚至重大危机，砥砺前行中不断攻坚克难，才能贯彻好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性。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迈步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推动中国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